

【保定研究】

略论孙承宗与袁崇焕及其评价问题

师昌纶

(甘肃省文史研究馆,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孙承宗、袁崇焕原来都是儒生、文官,在目睹强敌压境、国势临危之时,他们毅然习悉兵事,奋勇走出朝堂,顶风霜,冒锋镝,统兵作战,拼杀在御敌救国的最前线,彰显了精忠报国的儒将风范。二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孙承宗是上级、是先生、是引路人;袁崇焕是下级、是学生、是追随者。但是,从清初到今天,说到明末辽东抗清的英雄人物,人们大多知道有袁崇焕,却很少知道有孙承宗。其中缘由,当从清朝当政者基于自身立场的行为、《明史》编撰者有失客观与公允的记述和评论中去探寻。

关键词:明史;清史;孙承宗;袁崇焕;历史人物评价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6-0119-04

明朝初年,为安置居于吉林附近及穆稜河流域的女真族,置建州卫,岁一朝贡。又增置建州左卫,以猛哥帖木尔为之长(即清朝之肇祖)。他们之后逐步移至兴京(今辽宁新宾),又向西发展,与明朝贸易互市,也时有纠葛,渐至争战,双方角逐于山海关外至锦州一带。明朝廷即设辽总兵或经略、督师,率兵以制之。从神宗万历元年(1573)开始,陆续在此统兵主帅有李成梁、杨镐、熊廷弼、王化贞、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袁崇焕、高第、洪承畴等,其中当以孙承宗、袁崇焕功绩最著。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县(今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西庄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第二名。授编修、进中允。熹宗即位(天启元年,1621),孙承宗以左庶子充日讲官,熹宗称赞他讲得最好。是时,明朝与建立后金国的努尔哈赤屡次交战,经萨尔浒战役(1619)和辽沈战役(1621)之败,形势吃紧,朝中因孙承宗知兵,拟荐他前去主持军事,熹宗不舍。但孙承宗却对辽沈形势十分关心,上疏指陈当时兵事之弊说:“近年兵多不练,饷多不覈。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建议“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沈雄有气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又提出“抚西部、恤辽民、简京军、增永平(今河北卢龙)大帅,修蓟镇(今北京蓟县)亭障、开京东屯田”数策,得到熹宗的“褒纳”。他还提出对失职的边帅熊廷弼、王化贞等进行惩办,使“朝右耸然”。

天启二年(1622),广宁(今辽宁北镇县)战役,明军又败于后金。辽东经略王在晋要在山海关外再筑一道重关,其下属诸将袁崇焕、沈桀、孙元化等不同意,向朝廷报告,朝廷一时不能决定。孙承宗自告奋勇前往察看定夺。他到后,经过实地考察,以充足的理由否定了修筑重关的意见,提出坚守关外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及觉华岛(兴城县南十二里的海中)的意见。回朝后,面奏王在晋不能胜任,自请前往督师。遂于同年八月,以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便宜行事,不从中制”。他到任后,采取稳固防守、逐步推进的战略方针,招募、组训以辽人为基础的军队十一万。“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砲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其车营是创造性地将战车与火器结合在一起,成为以热兵器为主要杀伤手段的兵种。拜马世龙为大将,重用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祖大寿等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从而使形势大为改观,后金未敢轻易进犯。正当他准备发动进攻,收复失地

收稿日期:2012-07-05

作者简介:师昌纶(1925-),男,河北徐水人,馆员,主要从事文史研究。

之际,朝廷内却发生了变化,阉党头子魏忠贤利用熹宗年幼贪玩的“机遇”,把持了朝政。魏对孙承宗先施以拉拢手段,派其党徒携神炮、甲仗、弓矢及十万白金前来劳军,实际是窥探虚实。孙承宗听到消息,立刻给皇帝上疏说:“中使(太监)观兵,自古有戒”。而后对前来的太监又冷漠待之。魏忠贤见拉拢不成,便施以打击。孙承宗计划进兵,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魏忠贤把持的兵部、工部便勾结起来“相与谋曰:‘饷足,渠即妄为,不如许而不与,文移往复稽缓之’”。因而军饷不得,便不能进兵。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又“以简将、汰兵、清饷三事责孙承宗奏报”,实际是进行刁难。孙承宗考虑到自己所上“抗疏帝未必亲览”,便请给皇帝贺寿的名义,向皇帝面陈机宜,即仅带幕僚一人进京。阉党闻知,即造谣“承宗拥兵数万将清君侧”,魏忠贤绕御床哭,使熹宗心动,阉党即矫旨称“无旨离汛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发三道飞骑前往阻止。孙承宗行至通州,闻命只得返回。同年九月,马世龙误信降人之言,盲目进兵,“遂有柳河之败,死者四百余人”。“于是台省劾世龙并及承宗,章疏数十上”。孙承宗不得不知难而退,上疏请辞。昏庸的皇帝竟然照准,孙承宗遂于十月回朝。朝廷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之。这是他第一次督辽,首尾四年。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历任邵武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天启二年广宁之败后,袁崇焕不通知任何人,即单骑驰至辽东,历阅关内外,回来声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朝廷遂超擢为金事、监关外军,时辽东统帅、经略王在晋令他赴前屯(今辽宁绥中县西南五十五里)安置辽人的失业者。斯时正值孙承宗首次行边,袁即向他请求以五千人前驻宁远,得到孙承宗的首肯。袁到宁远后,即大筑城墙:“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次年竣工。袁崇焕与满桂“誓与城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至天启五年夏,孙承宗与袁崇焕计议,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居之。这使宁远成为内地。十月,孙承宗罢去,以高第来代。高第却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命令全部退至关内。袁崇焕则力争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只好留下宁远一城,其余“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

我退敌必进。后金见高第容易对付,便于天启六年(1626)正月,以大军西渡辽河,围攻宁远。袁崇焕“清野以待”,率众坚守,“发西洋巨炮,伤城外军”。后金兵只好败退,努尔哈赤受伤死,其子皇太极继位。袁崇焕乘势“渐复第所弃旧土”。尔后,明朝廷便擢袁崇焕右金都御使、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但魏忠贤仍然多方掣肘。时各地正媚魏忠贤为之建生祠,袁崇焕无奈,为缓和矛盾,也在辽东为之建生祠,却“终不为所喜”。天启七年(1627)五月,后金围锦州,守将赵率教坚守待援,而宁远的袁崇焕也同时被后金围困。后金兵退之后,魏党以袁崇焕“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不得已,提出乞休,同年七月得允,朝廷以王之臣代之。

未几,熹宗崩,庄烈帝崇祯于1628年继位,是为崇祯元年,崇祯开始颇想有所作为,先诛杀了魏忠贤,“削诸冒功者”。任袁崇焕“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同年八月,袁崇焕到宁远,平息了因缺饷而发生的兵乱。给朝廷上疏说:“臣以书生从督师辅臣孙承宗后,力主恢复,……逐步而前,战则一城援一城,守则一节顶一节。其议创于承宗,臣因之。”这是遵循孙承宗规划的战略守辽东,可谓“萧规曹随”。

孙承宗督辽之前,原为宰辅,居庙堂之高,看的是全局,而且关注于北边的形势。特别是他早年就“往来飞狐(今河北蔚县)、拒马(河名,源于河北涞源县)间,直走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又从乾干(山名,在山西大同东)、清波故道南下。喜从材官老兵究问险要阨塞,用是晓畅边事”。崇祯四年(1631)正月,他出关东巡,抵松山、锦州。又“西巡周遭边寨几三千里,皆奴虏(后金)出入残破之地,山谷崎岖,扶掖登顿。经边堡台墙,询问冲缓、器有无、哨远近,尖夜老卒往往能置对,而将领耗然无以应”。这种实地考察之功,在当时大臣中,无第二人。所以他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八条建议,崇祯看了,十分赞赏,“严谕饬行”。他还善于识别、使用人材,如他重用的几位将才,满桂、赵率教、何可纲等,不仅都能独当一面,且都是忠贞不二的,最后都在战场上殉国。他对于诚心归附的降将,也肯放手使用,如降将刘爱塔,归降后改名为刘兴祚,与后金血战,“斩首六百级”不幸被流矢死。其弟刘兴治则继续“听命杀奴(后金)以自赎”。对于毛文龙也是正确使用。毛文龙原以都司援朝鲜,后留在辽东,驻扎于皮岛,朝廷任为总兵。皮岛在辽宁省南大海中,东北望朝鲜,与登州联接,正好摄后金之背。但毛文龙“其本人无大略,往辄败衄,而岁糜饷无算”。孙承宗将他作为对付后金全盘中的一个环节,还是团结他,令其发挥牵掣后金的一股力量。

相比之下,袁崇焕则有一些不足之处。如在一次廷对中,他对崇祯说:“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这是在打包票,事后有人问他五年的方略是什么,他说只是随口一说而已,显是胸无成竹的轻率。对下,他不大善于团结人,如与满桂便处得颇不融洽。更大的问题,一是天启六年在努尔哈赤受伤而死时,他趁派使前去吊唁的机会,竟与后金谈和。这是未经请示而擅自决定而行的。事后奏报,“优诏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但就是这一

“和”，却使后金趁机“大兴兵渡鸭绿江南讨”，将朝鲜征服了，使明朝失去了一个助手，实是失算。另一件大事，便是擅自斩杀毛文龙。有的说毛文龙有私通后金的嫌疑，其实并不能落实，在问斩时袁历数毛的十二条罪状中，并没有说毛有通敌之事，就是明证。原来袁在来辽东之前，就对大学士钱锡龙说：对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杀之”。这种先人为主的见解，显然是不可取的。他斩毛后向崇祯报告，“帝骤闻，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这两件大事，对当时战局有很大不利影响，也为他自己尔后杀身的冤狱埋下了伏笔。

斩杀毛文龙，使“岛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后金没有了一方的后顾之忧。所以“甫三月”，即崇祯三年(1629)冬十月，后金皇太极即率数十万大军分道从山海关以西的龙井关、大安口进入长城，向北京推进。山海关总兵赵率教急忙入援，驰行三昼夜，“十一月四日战于遵化，(赵)中流矢阵亡，一军尽歿”。袁崇焕得到后金入长城的消息，即率师入卫。但他对后金兵不是追击，而是“率兵蹶之”，即跟踪，打算至京都城下再决战。当时有个副总兵周文郁进谏说：“大兵宜趋敌(即将敌赶走)，不宜入都。”袁不听。当时风传“崇焕道(导)建州兵入内地，而崇焕不知也”。结果他的兵“甫抵左安门，建州兵亦抵城下。都竟谓崇焕召敌，上不能无心动”。十一月初，京师戒严，危急时刻，朝廷又授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令其督师御敌。孙承宗到朝，崇祯匆匆召对于平台，即连夜巡视城防，部署防务。次日夜半又传旨令其守通州。孙承宗即率二十七骑出东便门，沿途历经艰险，以亡失三骑的代价到了通州，立即调动人马坚守这一屯粮的要地，并且派尤岱、刘国柱率兵五千、调密云兵三千、保定兵五千前去援救京城。

后金兵围京城，袁崇焕战于广渠门外。满桂战于德胜门外。满桂受伤，即开城令其部进入城内。旋召满桂、袁崇焕、祖大寿等陛见。袁崇焕请也如满桂例，允其部队入城，崇祯不允，实际此时崇祯已不信任他了。尔后，诸军在通州援军的配合下，将后金击退，京城解围。十二月初一，崇祯又召见袁崇焕、祖大寿等，“上问以前杀毛文龙，今逗留何也？崇焕不能答，遂下锦衣狱。”次年八月即将袁崇焕磔杀，兄弟妻子流三千里，“天下冤之”。但将袁下狱，使祖大寿害怕了，即于十二月四日率一万五千人东溃，远近大震。幸赖孙承宗派人持手书慰藉，祖大寿才心安。崇祯即命孙承宗前去镇守辽东。这是他二次督辽，他到后，“人心始定”，“大寿开城与语，即日列其所统步骑三万于教场，行誓师礼，群疑尽释”。旋即挥师收复了为后金所占的遵化、永平、迁安、滦州四城，“转战三百里，斩获甚众”，后金兵退到长城以外。孙承宗加紧整顿防务，局面得到稳定。崇祯为此加孙承宗太傅，孙力辞不受。崇祯四年(1631)，孙承宗下令修复锦州重要屏障大凌河城(在辽宁锦县东四十里)。刚刚完工，后金兵前来围攻。孙承宗亲到锦州组织力量援救。但辽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所派援军吴襄、宋伟又互闹矛盾，被后金兵击溃。致使大凌河“城中粮尽援绝，守将祖大寿力屈出降，城复被毁”。廷臣认为筑城失策，“交章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遂连疏引疾辞职。同年十一月获准回乡，又“追论他丧师辱国，夺官闲住”。孙承宗“家居七年，中外屡请召用，不报”。明朝廷屈杀袁崇焕，是自毁长城。对孙承宗，有大功则妒忌，有并不影响大局的小挫则两次革而不用，也是自毁长城。再三重复这样的重大失误，焉得不落个败亡的下场。

崇祯十一年(1638)，已经自称大清皇帝的皇太极又率大兵进入长城，长驱深入内地。已为平民的孙承宗虽无守土之责，但不仅不肯袖手旁观，而且立即督率子孙修缮高阳城，准备迎敌。十一月九日，清兵围攻高阳城，孙承宗率家人拒守，因众寡强弱悬殊，次月城陷，其子四、从子一、孙四、从孙六全部壮烈战死，全家被害40余口，“只逃一六岁孙及其母”。孙承宗力尽被俘，坚贞不屈，望阙叫头，投缳而死，年76。如此举家为国壮烈捐躯者，并世无二，其悲壮激烈，万古不朽！

从以上简述孙承宗、袁崇焕一生主要事迹来看，其共同点是，原来都是儒生、文官。他们本来可以在朝中坐而论道，以其文才为国服务效力。但目睹强敌压境、国势临危之时，便毅然习悉兵事，奋勇走出朝堂，顶风霜，冒锋镝，统兵作战，拼杀在御敌救国的最前线，这就是历史上美称的精忠报国的儒将风范。这种不计个人安危生死，一心救国的忠心，可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带砺。他们最后献出了自己以至全家族的宝贵生命，因而是惊天动地、万古不磨的民族英雄。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铭诸史册，为人民世代所敬仰。

两位民族英雄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孙承宗是上级、是先生、是引路人；袁崇焕是下级、是学生、是追随者。这从孙承宗给袁崇焕的一首诗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与尔筹边再阅年，东西烽火尚依然。……知君定发黄公略，自昔王师贵万全。”(注：黄公，当指秦隐士黄石公，为张良授书者。联系末句，即勉袁慎重用兵，取得全胜)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达了对时局的忧虑和对袁的期望与勉励。说明爱国者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策略。孙承宗在辽东运用新的战略，开创了新局面，袁崇焕“因之”而继续贯彻执行。当袁崇焕被下锦衣狱之际，孙承宗写诗云：“练尔多方练

未成,空闻曾饒尔前生。东江千古英雄手,泪洒皇龙半不平。”诗为其失误表示惋惜,也为其冤而鸣不平。可以想象,孙承宗在戎马倥偬之际也许进过拯救之言。怎奈自作聪明的崇祯听不进去,一意孤行,以致形成千古冤狱。自古以来,忠奸不两立,而忠常被奸所毁。还有一些人,自己不肯任事,却专门对任事者多方掣肘,有功则妒,稍见点小过,便立即拆台以至落井下石。因而在这帮人的“杂议”中,使孙承宗无缘施展其军事天才,使明朝失去一大柱石,导致明亡于清朝之手!

但是,从清初到今天,说到明末辽东抗清的英雄人物,人们大多知道有个英雄袁崇焕,却很少知道有个孙承宗。其原因何在呢?这就要看当政者的所为、历史的记述和评论了。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大多不会完全客观和公正。一般是有利于己者则强调之、夸大之,甚至捏造之;不利于己者则淡出之、歪曲之,甚至抹煞之。实事求是,谈何容易!《明史》是清朝大臣张廷玉等撰写的,他们必然是,也不敢不是站在清王朝的立场来书写史实、判定是非善恶、权衡利害轻重的。袁崇焕是崇祯杀的,为了突显崇祯的昏庸和失误,就必然加重袁崇焕的分量和作用。孙承宗及其家庭是清兵屠杀的,为了淡化、掩饰清的残忍暴行,就必然降低孙承宗的功勋和作用。试看《明史·孙承宗传》对他的评说:“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这是刻意贬低);而专任之,犹足以慎封固守(这是不得不说的实话)”,然仅此而已。以下却笔锋一转而为清献媚颂圣了:“盖天眷有德,气运将更,有莫之为而为者夫!”这是说清之兴是因其“有德”,有德必然是天命,气运所归,非人力所能左右了。试问屠杀了人家整个家族的,竟是有德吗?这个赞歌实在唱得驴唇不对马嘴,令人齿冷。而《明史·袁崇焕传》中则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字数不多,却有千钧之力。事实是袁死之后,孙承宗不是又任辽东主帅了吗?何谓无人!这是违背史实的评断,不值一驳。

不仅如此,到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乾隆更颁诏为袁崇焕平反,并在京都广渠门为之建立祠堂。这就昭告天下,可以公然歌颂了。其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清末,康有为还为袁祠写了多幅歌颂的楹联和诗篇。如果说,乾隆此举,是他有远见、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的话,那么,对比对待孙承宗就太不公了。清廷没有明令褒扬他,更没有为他立祠,而是冷处理。他是清的死敌,他和他的家族惨遭清兵屠戮。试问在有清一代,谁还敢歌颂这位民族英雄呢?由此来审视乾隆的远见,也是有条件、有限度的。他的祖上把孙氏满门都灭了,那种惨状如同“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京畿满族王公“跑马圈地”逼得无数百姓家破人亡一样。这些事还能提吗,提了就是给其祖上抹黑,就是自打嘴巴。所以就淡化、冷落、装聋作哑。有清一代二百多年的如此处理,使孙承宗这位轰轰烈烈的民族英雄,不但被埋没了,而且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延续至于民国以至当代。如今到了还历史以真实,还民族英雄应有声誉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在歌颂民族英雄袁崇焕的同时歌颂民族英雄孙承宗。

本文所据史料,出自《明史》、《明史纪事本末》、钱谦益《初学记·孙公行状》以及当代人孙华嵘、孙华岑(孙承宗十一世孙)所著《一个厚重的家族》。

On Sun Chengzong and Yuan Chonghuan and Its Evaluation

Shi Changlun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Sun Chengzong, Yuan Chonghuan were both Confucian scholar, civil servant before, but after witnessing the enemy invaded and the country in danger, they decided to fight in the front line against the enemy, which demonstrated loyalty to serve the country and their style of Confucianism. The two men were closely related: Sun Chengzong was a superior, the teacher, the guide; Yuan Chonghuan was the junior, the student, and the follower. However, from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o today, when it comes to the Liaodong Dynasty hero, most people know Yuan Chonghuan, but few know about Sun Chengzong. The false judgment came from the distortion of facts by rulers of Qing Dynasty, incorrect description and comments by compilers of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Key words: History of Ming Dynasty; History of Qing Dynasty; Sun Chengzong; Yuan Chonghuan; comments of history figures